

中国启蒙思想文库

张岱年 主编



尨书

章炳麟 著
向世陵 选注

中国启蒙思想文库

章炳麟 大同书

章炳麟 仁学

梁西学议 建国方略

使西纪程 砭旧危言

张园文录外编

章炳麟 尨书

盛世危言 新民说

论世变之亟 猛回头

新政真论 睡的人醒了

强学—戊戌时论选

民声—辛亥时论选

新潮—民初时论选

(辽)新登字1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尙书/章炳麟著;向世陵选注.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6

(中国启蒙思想文库/张岱年主编)

ISBN 7-205-02867-1

I. 尙…

II. ①章…②向…

III. ①章炳麟-文集②章炳麟-思想评论

③政治思想-思想史-中国-近代

IV. ①B259.22 ②D092.5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108号 邮政编码110001)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191,000 印张:10 $\frac{1}{8}$ 插页:5

印数:1—1,597

1994年9月第1版

1994年9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吴长勇

责任校对:安丽君

封面设计:赵多良

版式设计:赵耀今

定价:10.60元

“中国启蒙思想文库”总序

在历史即将跨入 21 世纪的时候，辽宁人民出版社推出了这套“中国启蒙思想文库”，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都是件极有意义，极值得称道的事。

尽管这些著述原是撰写于 80 多年以前，它的作者也和那个时代一起早已成了历史的陈迹；但是当人们重新翻阅这些古色斑斑的书页时，仍然无法轻松和平静。这是启蒙先驱者们的呐喊和沉思，它激昂、悲壮而又深沉无比，仿佛融进了多少代人的希冀与渴望。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的启蒙者和中国的启蒙运动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写下了最为辉煌又最为感人的一章。

它发生在中国大封建王朝彻底崩溃的前夜。这是一个前进与倒退、光明与黑暗、希望与失望交织的时代，亦是中国近代社会一个大转变的时代。那时，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都已落在西方现代文明的后面，国内矛盾重重，国外列强环伺。自 1840 年的鸦片战争始，帝国主义的坚舰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国门之后，中国就被推向了备受屈辱和更加不幸的境地。但是，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坚舰利炮并没有把中国人吓倒，相反却进一步唤醒了中国人民的民族危

亡感，从而开始了一场持久而又悲壮的救亡运动。民族救亡、爱国强国成了那个时代的最强音，也成了整个启蒙运动的主旋律。

但必须清醒地看到，中国近代社会大转变的时期也是“门户开放”、“西学东渐”的时期。西方的一些先进思想逐渐传入中国。当时一些先进的思想家一方面撷择中国古代典籍中有利于变革的观点，如《周易》的变易观念、《公羊传》的“三世”观念、《礼运》的大同思想等；一方面参照当时所了解的西方情况提出一些革新的方案。当时梁启超、章太炎通过日本译籍而了解西学，严复则直接介绍了西方近代的一些进步学说。严译的《天演论》介绍了达尔文进化论，在当时风行一时。孙中山则直接接受了西方近代的政治学说的影响而根据国情加以改造，对于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起了极大的积极作用。

中国启蒙运动的重要和伟大并不在于它是否取得了如何了不起的成就和胜利，而是在于它曾给人们心灵上所带来的强烈而持久的震撼，并不在于它自身理论的如何完美，而是在于它曾给予，并继续给予人们的启示和思索。许多启蒙思想家们苦苦追问和求索的问题诸如自由与平等、民主与法制、教育与科技、东方与西方、爱国与强国、农业经济与工业生产、儒家伦理与现代文明等等，即使在今天仍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因为启蒙者的思想连同那一次又一次的启蒙运动一起不仅属于遥远的历史，它同时更应该属于或必然属于今天和未来。虽然“洋务运动”过去了，

“变法维新”过去了，“辛亥革命”过去了，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启蒙运动并没有完结，五四运动便是启蒙精神的继续和发展。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在现代化建设的今天，我们一再提倡解放思想，更换脑筋，这又何尝不是启蒙精神在新时代的高扬？

今年是五四运动 75 周年，我们谨以这套丛书来纪念“五四”，也呼唤着新的启蒙精神的到来。

张岱年

1994 年 1 月于北京大学

编 序

《煊书》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革命家章炳麟的学术论文集，也是他的主要学术代表作。

章炳麟(1869—1936)，初名学乘，字枚叔；后更名绛，号太炎，浙江余杭人。幼年跟外祖父朱有虔读经，后从经学大师俞樾学习。甲午战争后，参加强学会。1897年在上海参与维新派《时务报》馆事宜，宣传变法。戊戌变法失败后遭通缉，逃亡台湾、日本，结识孙中山。1899年回国，次年初将他几年来鼓吹进化、维新的论文编集为《煊书》出版（“煊”，迫也。《煊书》即受国运所迫而非说不可的话）。

就在《煊书》(初刻本)问世的同时，中国的政局也发生着剧烈的动荡。清慈禧太后密谋废光绪帝而另立新皇的计划虽由于各国公使拒绝给予支持而夭折，但却充分暴露了光绪帝地位的虚弱，对于寄希望于“客帝”来变法的章炳麟，无疑是一个极大的震动。同年，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爆发，清政府始而支持、终而背叛的行径，更使章炳麟感到悲哀。随着他策动李鸿章等地方督抚反清独立幻想的破灭，唐才常自立军起事的失败，促使章炳麟的思想发生

了质的飞跃，由“尊清”走向排满和革命。他拥护和积极参与了孙中山领导的反清革命，对《客帝》和《分镇》进行了“匡谬”，认识到反满与反对列强侵略密切相关，并通过由“断发易服”到与梁启超等保皇党进行的论战，使他觉得必须对《煊书》进行系统的“删革”，以深入批判中国旧的思想文化和专制制度，阐明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的理论。1903年完成《煊书》的重订，同年为邹容《革命军》作序和撰《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推动了资产阶级革命高潮的到来。接着“苏报案”发生，被捕入狱。1906年出狱赴日本，参加同盟会，主编《民报》，与改良派论战。1910年退出同盟会，重组光复会，任会长。辛亥革命爆发后回国，1912年任南京临时总统府枢密顾问。次年因反对袁世凯被软禁，1916年获释。在软禁中删去了《煊书》中的许多唯物主义的和革命的思想内容，改名《检论》。1917年再度与孙中山合作，任广州护法军政府秘书长。护法运动失败后，章炳麟的思想逐渐落后于时代，“渐入颓唐”，但至终仍能坚持爱国主义的立场。1936年病逝于苏州寓所。

《煊书》初刻本原收论文50篇，同年再版，增“补佚”2篇；重订本正文63篇，“前录”2篇，“附录”4篇；《检论》正文62篇，“附录”7篇，改变《煊书》分篇不分卷的结构，辟成9卷。三种本子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是《煊书》初刻本的再版本和重订本。初刻本和重订本均以单行本问世，《检论》收入作者自定的《章氏丛书》出版。1984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将《煊书》初刻本、重订本和《检

论》合编为《章太炎全集》第3卷出版。

章炳麟的思想精深而广博，近代的先进人士很多都受到过他的影响。他热忱地吸收西方传入的新的科学文化，并以此对中国的旧有文化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力求融会中西文化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以为资产阶级革命提供必要的思想武器。鉴于《诂书》的版本和增删反映了作者不同时期的思想状况，根据该书在中国近代启蒙运动中的地位和对中国社会所产生的影响，决定采用《诂书》重订本^①作为《诂书》的代表介绍给读者，以便更加确切地把握和评价章炳麟的学术思想和学术地位。

首先，以反清革命和民族主义为先导的社会政治思想。这主要反映在《客帝匡谬》、《分镇匡谬》、《刑官》、《通法》、《定律》、《明群》、《明独》、《地治》等篇中。“排满”和“自主独立”是当时的资产阶级思想家所面临的最为迫切的问题。因为“满洲弗逐，欲士之爱国，民之敌雠，不可得也。浸微浸削，亦终为欧美之陪隶而已矣。”^② 满清对义和团运动的镇压实际上表明它已沦为帝国主义的帮凶，故不逐满清便不能真正做到爱国，自主独立就只能是一句空话。独立离不开国家的强大武装力量，“夫家有桎梏而国有甲兵，非大同之世，则莫是先矣。”^③ 反对欧美列强愚弄

①《诂书》重订本版本采用朱维铮点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章太炎全集》(三)。

② 《客帝匡谬》。

③ 《经武》。

弱小国家的“弭兵”之说，指出“然则今日之弭兵，特假强国以攘夺之柄”^①，实则无异于自杀。

章炳麟反对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但他同时也认识到应吸取西方政治制度的优点和长处。他肯定和赞赏西方的“三分其立法、行政、司法，而各守以有司”的三权分立的思想，要求“惟刑官独与政府抗衡，苟傅于辟，虽达尊得行其罚”^②，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主张中央和地方分权，实现地方自治。应当建立各级议会，有法依法，“无法者咨于议会而废兴之。”^③强调“民权”，不满于“人君尊严若九天之上，萌庶缩朒于九地之下”^④的封建专制。倡导个性的解放和杰出人物的作用，将“独行”救亡与人民的“合群”结合起来。认为他多年“求群而不可得”，是因为缺乏能群的杰出人物（大独），所以他呼唤杰出的人才出来组织新的“大群”，故“大独必群，群必以独成。”^⑤但他将政治的平等限制于法律的强制和评价的褒贬等方面，在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上，他是不赞同平等的。他将“天地之道，无平不陂”的古代辩证法运用来论证“政平而无威，则不行”，为君臣、父子、男女的不平等辩护，提出所谓“平等难”、“平等非拨乱之要”^⑥的观点。

① 《弭兵难》。

② 《刑官》。

③ 《地治》。

④ 《商鞅》。

⑤ 《明独》。

⑥ 《平等难》。

在经济基础方面，章炳麟提供了众多的改革方案，而其核心则在于土地制度。他接受了孙中山关于平均地权的土地改革思想，提出了一个土地国有、否定剥削和减轻租税的资产阶级的“均田”方案，以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在此基础上，应当保护和鼓励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阐明“商工百技，各自以材能致利多寡，其业不形，是故有均田，无均富；有均地箸，无均智慧”^①的资产阶级的反封建思想。并以为由此便能进达以均田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章炳麟虽然在社会关系方面认为当时倡导平等之说迂腐而“不切事情”，但他在经济上的均田均地主张却使他仍然走在当时思想界的前列。

其次，以进化唯物论和认识论为中心的哲学思想。这主要反映在《原变》、《原人》、《族制》、《公言》、《颜学》、《王学》、《订实知》等篇中。章炳麟接受并大力传播西方传入的生物进化论和社会生存竞争说。肯定生物都是进化而来的，他勾画出了一个矿物——菌、藻——鱼——猿猴——人的进化顺序。进化的动力是生存竞争，包括生物与环境间的竞争和种间竞争：“沧热燥湿之度变，物之与之竞者，其体亦变。且万族之相轧，非直沧热燥湿之比者也。”^②种间的竞争比起生物适应环境的竞争要更为剧烈。竞争是万物生存发展的基本动力，“物苟有志，强力以与天地竞，此古今万物之所以变。变至于人，遂止不变乎？”^③但人与万物

① 《通法》。

② ③ 《原变》。

也有差别，因为人能群，能组织成为社会，故人类社会的进化也就有自己的特点：“人之相竞也，以器。……石也，铜也，铁也，则瞻地者以其刀辨古今之期者也。”^① 突出了工具和兵器在人类社会进化中的作用。他以拉马克的“用进废退”来补充达尔文的生存竞争和自然选择，因为这对于中国人的自强保种要显得更为贴切。生物在适应自然的过程中都是“蜕其故用而成其新用”的，蜕故成新是宇宙间的普遍规律。譬如，“鲸有足而不以公，羴有角而不以触，马爵有翼而不以飞，三体勿能用，久之则将失其三体”^②。强调人的智力的增进是章炳麟鼓吹进化的一个重要目的，因为人们如果：“浸益其智，其变也侗长硕岸而神明；浸损其智，其变也若跛鳖而愚。”^③ 但人只能在社会中才能增益其智力，否则将不可避免地退化：“人之怠用其智力者，萎废而为废雌。人迫之使入幽谷，天阨天明，令其官骸不得用其智力者，亦萎废而为废雌。”^④

人的智力的增进不就等于人的认识水平的提高，所以他花了极大的精力投入到认识论问题的研究。认为人们通常用气来解释人的身体构造，这从人死之后肉体血脉的自然转化可以得到证明。但却不能用气来解释人的思维，因为“精气为物，其智虑非气也。……感有交错，以成智虑。”^⑤ 思维是感官与外物发生作用后才产生的。西方近代经验论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以感觉器官的局限性来否定感觉对象的

①②③④ 《原变》。

⑤ 《原教下》。

客观性。章炳麟承认感官有局限，如有眼病者视火光为青色，日光经三棱镜而有七色等。但这否定不了感觉对象的客观性：“不见其光，而不得谓之无色；见者异其光，而不得谓之无恒之色。虽缘眸子以为艺极，有不缘者矣。”^①对象本身并不依赖于感官而存在，接受洛克“人之精神如白纸”^②的观点，坚持认识来源于经验。但同时也重复了宋儒“知在行先”的旧说。

比之他对经验的关注来说，章氏更为强调理性思维在认识中的作用。清初大儒颜元，讥讽程朱以“讲读为求道无乃以习琴谱代替学琴，无疑是对的”，但若由此“舍琴谱以学琴”，舍弃抽象而滞于有形，也是学不好的。“独恨其学在物，物物习之，而概念抽象之用少。”^③人的认识活动，在直接知识一面，须首先通过感官与外物接触（所合），然后上升为概念（言），再通过归纳推理（譬称）达到与具体概念不直接对应的类概念（大共名）。而在间接知识一面，人们虽可利用已有的概念系统进行推导，但仍离不开客观标准（非无成极），决不能凭主观臆断（恣臆腹以为拟议）。但他又认为“圣人以上知千世，下知千世，则不藉于物矣。”^④他还从效用出发，把一切概念抽象都看作是有用的：“观今西方之哲学，不齎万物为当年效用，和以天倪，上酌

① 《公言》。

② 《王学》。

③ 《颜学》。

④ 《颜学》。

其言，而民亦沐浴膏泽。虽玄言理学，至于浮屠，未其无云补也。”^① 这里他将西方近代的先验论哲学和理学、佛学放在了一起，实际上预示着他后来所走的结合它们而构造唯识唯心的宗教哲学体系的道路。

第三，以重新评价孔子、儒学为契机的学术思想和对文化专制主义的批判。这主要反映在《订孔》、《原学》、《学变》、儒家与诸子相比较的多篇论文和《清儒》、《哀焚书》等篇中。孔子和儒学在古代的中国无疑具有巨大的权威，敢不敢触动孔子实际上成为近代启蒙运动能否深入下去的症结所在。在他之前的康有为、谭嗣同等都没能走到这一步。章炳麟对孔子进行了中肯的分析，认为他是古之：“良史”。孔子“次《春秋》，料比百家”^② 而对古代文化的保存和传播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但他的思想的理论水平不高，远不能跟荀子相比。后来的统治者不顾事实，“虚誉夺实”，一味抬高孔学而贬斥荀学，结果造成了中国社会的停滞和保守。章炳麟的这些言论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他并由此将儒学与墨、道、法、侠客和兵家等进行了对比分析，肯定了墨家、道家、法家、侠客和兵家都各有其长处。儒家正统的学术史观将董仲舒作为孔孟以后的儒家的代表，但“董仲舒以阴阳定法令”，俨然“教皇”一般，“使学者人人碎义逃难，苟得义禄，而不识远略”^③，故不得

① 《原学》

② 《订孔》。

③ 《学变》。

不为扬雄的《法言》让位。章氏高度评价了王充的《论衡》在学术史上的贡献。它“趣以正虚妄，审乡背。怀疑之论，分析百端。有所发擿，不避孔氏。汉得一人焉，足以振耻，至于今，亦未能有逮者也。”^①可惜王充的这种批判精神在后来并未能得到发扬和光大。

章炳麟总结学术发展的指导思想是“实事求是”，据此他认为宋以后学术的衰退和僵化，程朱支离的“瑕疵”固有其责，但祸首并非程朱，因程朱犹能“审己求是”，要远远强于不通六艺、不习正义，又不辩于名理的欧阳修、苏轼等人的学说。对于“疾首以攻朱学”的王守仁，由于其学术空泛，“立义至单”，同样“支离”。故其“数传而后，用者徒以济诈，其言则只益纡简粗粗”^②。章氏对程朱、陆王都不是简单地否定，而是肯定他们各有长处，但在后来，“明之衰，为程朱者痿弛而不用，为陆王者奇觚而不恒，诵数冥坐与致良知者既不可任”^③，故颜元返归于直接实践。颜氏虽因忽视概念抽象而受到章炳麟的批评，但仍不失为继荀子而后的又一大儒。基于同样的道理，他中肯地指出了戴震等朴学大师们的功绩和不足，即“不以经术明治乱，故短于风议；不以阴阳断人事，故长于求是。短长虽异，要之皆征其文明。”^④到了近代，社会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他

① 《学变》

② 《王学》。

③ 《颜学》。

④ 《清儒》。

在比较了中西学术发展的同异之后，指出学术的发展是受“地齐”（地理环境），“材性”和“政俗”的影响的，而在当今的时代，“政俗”即社会政治的现实成为决定学术发展的更为根本的东西。人们应当随时吸收新的思想和方法来改进自己的学术研究，提出了“必以古经说为客体，新思想为主观，庶几无愧于作者”^①的学术研究的新的指导思想，突出了主体的自觉能动性。与此相对照，他特别批判了清统治者大兴文字狱的“愚民”政策和文化专制，揭露了他们借修《四库全书》之机而禁毁“故籍”、阉割历史的险恶用心。但愚民政策最终是使清统治者自食其果，以至沦落到连自己的文件诏书都不能保的境地。进而，对文化专制所导致的丧权辱国的惨痛教训进行了总结。

第四，立足于民族自尊的文化人类学思想。这主要反映在《序种姓》上下、《族制》、《方言》、《订文》、《订礼俗》等篇中。章炳麟详细考查了不同民族的历史，提出了“历史民族”的概念，认为民族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人种之同异，“要以有史为限断，则谓之历史民族，非其本始然也。”^②而相对应的天然民族的概念，只能解释种族的自然特征，而不能说明社会风教的变化。所谓“燥湿沧热之异而理色变，牝牡接构之异而颅骨变，社会阶级之异而风教变，号令契约之异而语言变。”^③社会的风教和语言是由社会发展自身的原因所造成的，由此下手才能

① 《哀清史》附录《中国通史略例》。

②③ 《序种姓》上。

恰当地解释中华民族的大家庭是通过不断的交往、迁徙、战争才融合发展而成。他以《世本》和《尧典》等著作的记载为据，通过对姓氏的研究，阐明了中华民族同其他民族一样，也经历了由野蛮到文明、由母系社会到父系社会的发展阶段，民族的同化在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这是“历史民族”的自然融合，是必然的趋势，不能因为反对满清贵族对汉族的压迫就不承认民族融合的历史事实。章氏虽也不时流露出汉族文明对其他文明的优越感，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在客观上~~也有自强保种的进步意义，它曲折地反映了~~抵抗外侮~~和资产阶级要求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的直接要求。民族主义历来是捍卫民族独立的有效武器。而从更高的角度看问题，他肯定中国和西方的文明都各有自身的作用，~~在平等~~同西方民族在肤色上的差异，并不影响各自都是智慧民族：“如欧美者，则越海而皆为中国，其与吾华夏黄白之异，而皆为有德慧术知之氓。”^①

当然，章炳麟并不认为中华民族的素质不需要改良，相反，按照他所接受的优胜劣败的进化规律，不改良就只能走向灭亡。所以他特别强调“人种改良”而主张优生，“遗传之优劣，蠢愚系焉；血液之衺杂，强弱系焉”^②，种族通过逐代的优生选择而得以改良，最终“几全为优种矣。”^③但是，自然的遗传和选择并不是决定民族素质优劣的唯一原

① 《原人》。

②③ 《族制》。

因，优胜劣败还取决于人为自身的努力。“今吾中夏之氏族，礧落彰较，皆出于五帝。五帝之民，何为而皆绝其祀也？是无他，夫自然之淘汰与人为之淘汰，优者必胜，而劣者必败。”^①自然淘汰与人为淘汰是共同起作用的因素，人们不仅要优化自己的遗传素质，更要通过后天的学习变法革新，砥砺前行。

最后，章炳麟还对中西文化进行了多方面的比较分析。他在吸收西方社会学、人类学研究的有益成果的同时，特别注意维护华夏及其他弱小民族的固有传统，反对西方列强的文化侵略。当时西方文化侵略的一个突出表现是传教，其论据便是认为落后民族没有宗教。而在实质上，天国神权的独尊是为人间民族的臣服开道的，“争教”、“忧教”反映的是忧国忧民和救亡图存的情怀。为此，在《原教》、《争教》、《忧教》、《通谿》等篇中，章炳麟利用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积极的应战。他指出宗教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一方部成而有政教”，“或言中国无教”实属“谬误”。^②是否有宗教，不能只看是否有基督教那样的宗教形式，根本的问题在内容：“凡宗教，其外声形色采，深结于内容。”^③而要真正了解内容，只能经过深入的调查。“大氏欲谏知宗教者，宜入其乡井，睹其翁姬，则浸知其神圣，所以谨儆。”^④据此，章氏考察了华夏宗教的发展史，认为宗教本身也有等级高下，有“民间宗教”即自发的宗教，也有

① 《族制》。

②③④ 《原教》上。